

高校性骚扰并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就能阻止的。高校、社会都要有一个意识——“高校并非净土”，高校人士有权之后也可能滥用。在师生关系中，教师是强势方，有资源能控制学生发展之时，师生关系容易变成利益关系。

对高校性骚扰说“NO”

■本报记者 温才妃

这个新年的平静被一则高校性骚扰事件打破。

2018年1月1日，华裔学者罗茜茜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1月11日北航发布通报撤销其教学、行政职务。1月14日教育部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

而就在北航性骚扰事件曝光不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也爆出副教授性骚扰事件，目前校方已成立调查组，正在作进一步核实。

和曾经的厦门大学博导性骚扰事件很像，它并没有因为事件的结束而沉寂。起码在高校人中的声讨之声愈演愈烈。

1月21日，包括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的教师发出实名倡议《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希望教育部门及高校、中小学制定严格细致的反性骚扰政策及规定，以支持和保护性骚扰受害者。

无独有偶，性骚扰事件近期也在国际上发酵。科学界的性骚扰问题入选美国《科学》杂志“2017年度崩溃事件”。如在2017年里，波士顿大学教授被指上世纪90年代在南极考察期间性骚扰女学生；罗切斯特大学9名研究人员起诉学校，认为他们因投诉一名教授性骚扰学生的行为而遭到学校的报复。

频发的性骚扰事件，揭开的是高校乃至社会的伤疤。

你知道什么是性骚扰吗

“你知道什么是性骚扰吗？”2017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对6592名高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13%的人认为只有强行进行肢体接触才是性骚扰。

事实上，这些年来被曝光的高校性骚扰事件，都是显而易见的强行肢体接触。如2014年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被学生指控长期猥亵诱奸女学生，2017年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揭发被班主任的父亲性侵害。

然而，性骚扰的实际范畴却远不止如此。2005年5月21日，《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首次对性骚扰罪作出行为限定。草案第三十八条：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任何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对于性骚扰的无知，导致人们对形形色色性骚扰熟视无睹。近年来，高校里公然张贴带有性暗示的横幅，一些导师对学生张口就来的黄段子，甚至男女生之间一些不该有的触碰，其实都属于性骚扰。

性教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玫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大多数教师、学生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些就是性骚扰。甚至一些涉事教师还觉得是‘学生太过矫情’；学生也很自责，认为‘自己不够随和’。”

那么，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才能算作构成性骚扰行为呢？法律上的界定也并不清晰。

在张玫玫看来，让接受者感觉到内心不舒服、身体不舒服的行为，就可以界定为性骚扰。“性骚扰的行为，不只发生在男老师与女生之间，还有男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老师对男生、女老师对男生的不正当骚扰。尽管后者比例小，但也属于性骚扰行为。”而后者更是处在法律的空白地带。

“红七条”为何禁而不止

早在20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发布的一项针对27所美国大学15万名学生的调查显示，在教师或辅导员对女生实施性骚扰的情形中，女研究生为受害者的占比为15.8%，本科生为受害者的比例为4.9%。但其中只有28%最严重的案件被报告到相关组织或部门。

在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调查中，在经历性骚扰后的反应上，选择沉默和忍耐的女性占46.6%，男性占48.1%。如此低的曝光率也使得性骚扰者的手越伸越长。

尽管教育部于2014年公布了高校教师师德“红七条”——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但事实上约束的是其中“最严重的案件”，因为它并未界定具体的性骚扰行为，所以一些不明显的性骚扰并不被等看待。

北航性骚扰事件之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而之所以没有操作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缺失相关。

事实上，全国人大多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法》，然而，最终未通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取证困难。

张玫玫指出，性骚扰通常是两个人的场合，除了性骚扰语言可以被录音设备录下，一些眼神、动作是瞬间发生的，即便该场合有摄像头，也未必能拍下来。因此，在很多性骚扰事件的处理中，无辜者有口难辩，被害者又拿不出证据，通常就不了了之了。

“理论上，上至国家、下至学校都应该建立相关规范。但如今国家法律未出台，教育部未作具体规定，让学校依据什么去制定细则？这是有一定困难的。”张玫玫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看来，“高校性骚扰并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就能阻止的。”高校、社会都要有一个意识——“高校并非净土”，高校人士有权之后也可能滥用。在师生关系中，教师是强势方，有资源能控制学生发展之时，师生关系容易变成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性骚扰就同腐败的逻辑相同，有些人因为利益向腐败妥协，或者当权者利用权力进行交易。”

比如，在大学里不被禁止的“师生恋”，究竟是真的“恋”了，还是教师利用身份、资源对学生有性企图，或学生希望借此从教师那里得到好处，通常说不清楚。

远离性骚扰从校园做起

26岁台湾女作家林奕华在2017年4月自杀了。她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述了教师诱奸学生的故事。在她死后，其父母在网上公开了女儿自杀的真正原因——十多年前被老师诱奸，并长期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张玫玫指出，大学比社会环境简单得多。如果大学里都学不会保护自己，等进入职场后，面对上级与下级、服务人员与客人等强势对弱势的局面，被性骚扰伤害的程度只会更严重。

“什么是性骚扰？”“怎样学会拒绝性骚扰而不让更大的伤害产生？”……在她为大学开设的性教育课上，她极力扭转学生“性骚扰不算事儿”的想法。“一些学生认不清性骚扰的危害，他们总认为有更重要的事情‘排’在自我保护之前，如获得学位、顺利毕业、推荐留学等需要从导师那儿获

得批准、帮助的事。真正遇到性骚扰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张玫玫指出，如今开设性教育课程的高校并不多，性教育又非通识课程，没有上过课的学生占多数。“实际上，不光大学得讲，中小学也要开课。”

“女生找男老师，第一要结伴而行，第二要开着门，即便男老师要求关门也不能关，第三感到被骚扰要立即拒绝或离开……”“男老师找女生谈话，第一不能单独谈话，第二必须开着门，第三必须与她保持一定距离（身体和心理距离）……”授课时，她如此告诫着未来从事基础教育的师范生。

张玫玫表示，教师对学生必须有所尊重，尊重包括交往要有一个界限，哪些话不应该说、哪些行为不应该做，应和学生的身体保持多远的距离……基本操作一旦有了道德约束，就可以杜绝一些性骚扰发生，也不会让学生误以为是性骚扰。同时，这对教师而言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而对于教师行为规范的教育，从新入职教师培训就必须有所强调。”她补充。

透过性骚扰看学生权利保护

“不能就性骚扰谈性骚扰。”程方平认为，应该透过性骚扰事件看学生权利的保护。

他举例，在前些年的调查中，一些教师故意把考题出得很难，让班级30%以上的学生挂科，借此给学生打电话，“这实际上就为送礼、性骚扰等行为提供了环境。”

“出现这样的问题，教师是否也有责任？而不是一味地把责任归于学生，让其留级、劝退。”程方平表示，高校应该建立相关机制，保护学生的权利，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渠道反映问题。比如，高校的工会、妇联应该承担起帮助女性维护权利的责任。

目前，法律上采取谁检举谁举证的原则，性骚扰事件通常都是由弱势方提供证据，使得弱势方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实际上，在相关事件上，法律更应监督的是有权者、强势方。”程方平补充。

国外的一些做法或许可以借鉴。据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侯定凯介绍，美国于1990年颁布联邦政府层面的校园安全法规《克雷利法》，规定公立学校和大学必须发布各校的年度犯罪资料（其中包括校园性犯罪的情况）。违反者将面临联邦教育部近55000美元的罚款。“许多美国高校新生在入学时就会获知本校有关犯罪率方面的数据，以此作为对校园安全管理的一种监督。”

侯定凯建议，我国政府立法部门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基础上，应对《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进行修订，对包括性骚扰在内的各类校园性侵权行为作出更为清晰、准确的司法解释，以便为国家的执法部门、社会组织和学校出台、执行相关规章提供更可靠、权威的法律法规。

“教育部门还应规定高校强制性披露信息，报告各学校的犯罪记录情况。至少应该把问题放在公开场合来讨论。如果高校有护短行为，直接问罪一把手，并设立举报电话反映情况。”侯定凯如是说。

中国大学评论

近一段时间，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自杀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中，自1月8日，死者的哥哥杨宝佳以及西安交大新闻中心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后，其女友于以网名“追寻杨宝德”发布的长微博：《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一文更是将这一事件推到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中。

该文文中称，2017年5月，杨宝德曾想自杀，但被阻止。杨曾因周老师批评产生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致独自步行去秦岭，自杀未遂。回校后有跳楼倾向，被女朋友发现后制止。

“12月18日，周老师答应杨联系出国事宜，他很高兴想考英语资格证。12月21日，杨却因学英语而被周老师批评，让他明白周老师不会放他出国。……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对此，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关于杨宝德自杀的原因，学校目前还在调查中。

在学校的调查还没有出来之前，就认定导师“奴役”学生，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毋庸置疑，当下导师和学生的“老板与打工仔关系”，也会令网友朝那方面想，因此，学校不能因博士生已是成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敷衍调查。深入的调查不仅是对遭质疑的导师负责，也是对当事博士生及其家属负责。如果调查显示不存在所谓导师“奴役”学生的情形，那就给被质疑的导师予以清白，而这也有助于大学了解学生个体所存在的心理问题，以此加强对研究生、博士生学习生活状态的关注，减少极端事件的发生。而如果确实存在导师侵犯学生合法权利，致使学生抑郁的问题，那必须追究当事导师的责任，并反思学校研究生导师制存在的问题。

有部分学校办学者声称学校现在已经变为“弱势群体”，其理由是学校的办学经常会遭遇质疑，甚至个别学生、家长为获得利益而故意抹黑、造谣中伤。表面上看似如此，学生、家长会利用越来越发达的自媒体平台发声。但是，这更和学校的应对有关。因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信息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掌握话语权者会占据优势，成为主导话语的一方。但在当前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没有哪一方单独掌握话语权，可禁止另一方发表自己的看法。只要学校以处理的心态直面质疑、问题，独立、公正地处理，就不怕质疑。问题的处理最终不是看谁的声音高，而是有事实依据。

这正是学校办学所需要适应的新环境。但我国学校办学并不太适应，这是因为大学办学缺乏开放意识和民主管理。具体到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问题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在我国大学中，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并不平等，导师利用导师职权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包括以学业成绩、毕业等要挟学生，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性侵害者也不在个别，这是不健康的师生关系。之所以存在这种关系，并有“合理化”的趋势——学生称导师为“老板”已经有长达20多年的历史了。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学没有改革管理制度，约束导师职权，只是强调教师道德和自我约束；另一方面是没有健全、畅通学生维护自身权利的渠道，由此使学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学生权利被侵犯后，维权只有借助自媒体平台或者传统媒体，形成舆论力量，迫使大学进行调查，而有的大学面对质疑，还死活不严肃启动调查。显然，真正的弱者当然是学生群体，而非被质疑的学校。学校之所以有“弱者”感慨，是因为一再发生这样的事，严重伤害大学的公信力，大学一旦被质疑，就会让舆论普遍相信一定有负面问题。这也会对构建健康师生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双方是基于防恶或利用而非基于信任、合作、共同成长建立师生关系。

这是不利于大学办学的，要树立大学的公信力，除了直面质疑，坚持原则，属于法律的问题按法律程序调查处理，属于教育和学术的问题按教育规则和学术规则处理外，更重要的是要切实推进学术自治、学生自治。学术自治是建立学术共同体，由学术共同体明确导师职权，包括规定导师不得布置给学生超出完成学业、获得学位之外的任务，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则应由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启动调查、作出处理，以维护导师群体的教育和学术声誉。学生自治则是赋予学生参与学校办学监督、评价的权利，当发生导师侵犯学生权利的事件后，学生可通过学生会组织维权。这是构建健康师生关系的基石。

大学是舆论场中的弱者吗

■熊丙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空间物理专业党支部：

以党建助推“双一流”建设

■本报通讯员 桂运安 记者 温才妃

43名教职工中，有23名党员。23名党员中，就有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4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8名教授，其中90%以上具有留学经历。这样的党支部在全国来说，虽不能言“绝无仅有”，但也是绝对“稀有”的。

集聚如此多高层次创新人才，这一党支部究竟出自何方？它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空间物理专业党支部。

学科发展蓬勃向上

2017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主任窦贤康顺利当选中科院院士。“其实，窦贤康院士只是我们支部走出去的一个代表。”中国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空间物理专业党支部书记、特任教授苏振鹏说，他们通过把党建与实际工作结合，以空间物理学科点的发展为中心，为服务学院“一流学科”建设和学校“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们空间物理专业不仅是国家重点学科，团队也是国家基金委支持的创新群体和科技部支持的重点领域创新团队。”中国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执行院长汪毓明说，他是空间物理专业党支部的普通党员，党支部搞党建不喊口号，而是用创先争优的理念指导科研和教学，把党员的带头作用潜移默化地融入到科研和教学中去。

中国科大空间物理学科经过近60年的发展，科研手段从原来单一的数值模拟计算发展成为具有观测研究、数据分析和理论计算能力的综合手

段，形成以空间物理为主体的中科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发展出“日地空间物理”“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电离层和中高层大气动力学”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均为党员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我们就是要瞄准空间环境保障、深空探测等国家需求，为科技强国服务。”汪毓明说。

近五年来，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下，中国科大空间物理学科蓬勃发展，新增科研项目200余项，科研经费超过2亿元，曾经五年内获得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仪器专项。

先锋模范激发力量

29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并晋升为正教授；36岁成为长江学者……汪毓明是中国科大空间物理专业党支部众人仰慕的“先锋模范”。“我本科时就入了党，导师是支部里75岁高龄的老党员，中科院院士王水。”汪毓明说，“党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要爱国、有责任心，这些是老师在言传身教中告诉我的。”

在采访中，他还透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他曾到美国交流学习了几年，2008年回国的时候，妻子已经怀孕并即将生产，很多人劝他再等等就能生个“美国宝宝”。“祖国未来会更加强大，宝宝要美国国籍有什么用？”他笑言。

对于汪毓明来说，回来就是想干一番事业。近

年来，他瞄准日冕与行星际动力学研究，首次提出多重磁云概念，首次报道强激波传入并压缩磁云的观测事件，首次发现日冕物质抛射之间的超弹性碰撞现象，对建立更为准确的空间天气预报模式，保障航空航天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他本人也获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中科院青年科学家等荣誉，并入选我国新世纪百万人才工程和科技部的中青年创新领军人才。

“看着祖国慢慢强大，我不想干一个看客，而是想赶紧回来投入建设。”中国科大空间物理专业党支部成员、教授雷久侯说，在2011年全职回国前，他曾在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等单位工作过6年。如今，他已成为中组部首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并参与了国家“子午工程”，为我国大型空间环境观测网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了强劲的创新力量。近5年来，中国科大空间物理学发表SCI论文200余篇，许多成果具有显著的国际影响，特别在仪器研制和自主探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人才培养把准方向

在不少高校，教授既不愿给本科生上课，更不愿担任“班主任”。他们往往更加看重自己的科研成果。不愿意在学生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担任班主任需要寻访宿舍，需要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完成学业，这的确占用了不少时间。但如果能培养出更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空间物理专业党支部畅谈科研发展心得。

的创新人才，那比自己在学术上出成果更高兴。”苏振鹏说，作为党员更不能忘了为学生服务。

特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这些是苏振鹏的“头衔”，但对于中国科大2016级空间物理学专业的72名同学来说，他是任课老师也是班主任。“苏老师喜欢与我们交流各种问题，有什么困难只要找到他，他都会热情地伸出援手。”说起这位负责的班主任，众多学生一致“点赞”。

“这些孩子都是科学家的‘苗子’，但从高中到大学，有一些学生状态没有调整过来，对一些暂时陷入学习困难的学生，需要做好心理疏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尽快进入状态。”苏振鹏说，科研之外与学生交流，同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像苏振鹏这样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并担任“班主任”的党员并非个例，党支部成员、副教授夏海云也是如此。他曾带过一个班，几十名学生除了保研的，其余全部考上研究生或出国深造的。

此外，该党支部还通过开展科技活动周等活动，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创新意识。“这是一个重视科学梯队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的支部，这是一个有着良好传帮带传统的支部。”汪毓明自豪地说。